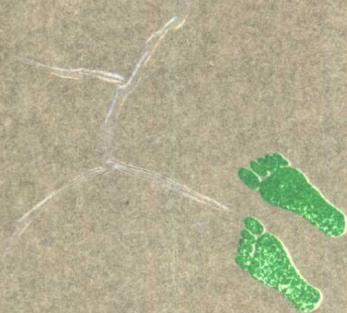


人类学

雅·雅·罗金斯基 马·格·列文 著
王培英 汪连兴 史庆礼 贺国安 译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人 类 学

〔苏〕 Я.Я.罗金斯基

著

М.Г.列 文

王培英

汪连兴

译

史庆礼

贺国安

警官教育出版社

Я.Я.Рогинский М.Г.Левин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Издание Третье, переработа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78
根据苏联高教出版社 1978 年修订第三版译出
人 类 学

〔苏〕Я·Я·罗金斯基

М.Г.列文

著

王培英 汪连兴

译

史庆礼 贺国安

★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贤孝里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附中印刷厂印刷
850×1620 毫米 32 开本 26.125 印张 678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1027-2195/c·4 定价: 18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广泛总结了全世界的人类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系统全面地讲述了人类形态学、人类起源和人种分类研究学科的内容。作者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在世界人类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本书几十年来，由原苏联教委定为大学教科书，后又作为人类学基础知识入门书广为发行。其适用范围——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原始社会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人文地理学、法医学、医学解剖学；也为下述工作部门提供参考——轻工业产品设计、医疗器械设计、机动车和航空器驾驶室设计、航空航天保健、刑事侦察、美容。

关于本书作者和现代人类学(序言)

В.И.阿列克谢耶夫

(原苏联科学院院士)

Я.Я.罗金斯基和 М.Г.列文合著的教科书《人类学》译成中文出版，这是苏联人类学国际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本书是译为中文的第二种俄文人类学书籍——第一种是十年前出版的 Т.И.阿列克谢耶娃所著《地理环境和人类生物学》，于1987年译成中文。罗金斯基和列文的这本书已出版三次（1955年，1963年和1978年），一直被作为大学教科书，现在则又作为人类学基础知识的入门书而广为发行。本书广泛总结了世界经验，当然，首先依据的是俄国和苏联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就使本书特别有益于读者了解苏联人类学研究的现状和俄国人类学的历史，以及其成就、分歧、讨论的热点问题，还有关于人类形态学、人类起源、人种分类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情况。

诚然，我们都知道，本书的基本内容写于50年代初期。在该书第二版时，两位作者进行了增补；到出第三版时，列文已过早去世，罗金斯基独自进行了修订，又加了些补充和注释，但是，全书的结构依旧，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类学部分章节，这在书中已具体说明。与此同时，从本书第一版到现在已过去了30多年，其间形成了人类学的许多新部门，方法论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即使是在论述和阐释部分也出现了明显的、甚至是重大的进展。不言而喻，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笔者不可能对

上述一切发展情况作出详尽无遗的介绍。然而，对当代人类学发展趋势的匆匆一瞥，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一些东西——而这是本书作者们限于所处时代的水平所无法办到的，尽管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专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特别重要的，自然是本书中未反映出的对人类起源的许多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所依据的许多古人类材料正是在中国发现的——譬如，当代围绕人类发祥地问题的争论以及关于存在几个现代人形成中心的观点的变化。有关现代人形成中心这一问题的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对于构拟人类种族分类的正确模式，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关于本书的作者

雅科甫·雅科甫列维奇·罗金斯基生于1895年，马克西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列文生于1904年。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同辈人，然而，列文是作为一个中学生迎接十月革命，罗金斯基那时却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俩都在莫斯科大学获得了卓越的教育，罗金斯基利用沙皇时代大学举办课外教育的机会，凭个人爱好旁听了对生物系学生来说非必修的许多哲学课程，列文则增修了医学课，并获得临床医生开业证书。结果，他们作为知识渊博、眼界宽广的人类学家相得益彰，加上彼此之间的诚挚友谊，他们在科学上的合作就更显得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不言而喻，高级科学家创造性合作的效率，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广泛而多样的兴趣，彼此之间的关注和互相交流的信息，不如说是取决于他们每一个人在合作中的独特贡献，彼此的不可替代，以及各自给对方的研究能力和成就以补充的可能性。罗金斯基作为理论家，甚至如同同事们所常称呼的那样，作为人类学哲学家，同列文这位解决人类学和民族学具体问题的出色行家完美地相辅相成。然而，若不对他们的科学道路和基本的科研成果哪怕

是稍加分析，上述论断就变得毫无根据了。

罗金斯基实际上很少从事有关原始材料的工作——这是指收集现代居民的躯体学材料、古人类学材料和现代动物群落的头骨学材料。例外的只是他的两部著作：写于1934年的关于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埃文克人的文章和写于1961年的关于克里木地区鞑靼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相隔久远，这一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他很少在 firsthand 原始材料上化费精力，也没有进行经验分析的兴趣。我们似乎还可提到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在1954年他对出土于克里木地区斯塔洛塞列洞穆斯特地层的一具人头骨的第一次描述。然而，这同上文所述并不矛盾，因为人类起源问题及各种化石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罗金斯基对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居第一位的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他为此写过一系列著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下列三部：1949年写的关于人类种族的形成中心的专著，1951年写的有关现代人起源中重要的人类学问题的长文，以及1969年写成的有关人类形成过程中的因素的专著。应该强调指出与这些著作有关的下列两件事：作者在演讲时充分论证了人类起源单中心假说，并与此相应，具体地论证了有关智人化的促进因素的假说。后一假说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可能是由于它最早提出了人类行走姿态在由尼安德特人向现代人进化过程中的社会阐释。罗金斯基写道，“现代人赖以区别于尼安德特人的形态学特点，使得现代人更加适应集体的社会生活”，他特别指出了其中颅骨上超结构的弱化和额骨形状的变化——这是人脑、尤其是额叶部分进化的标志。这一点业经临床观察证实。

人类起源单中心假说同魏敦瑞提出的多中心假说相对立，它假定现代人形成于人类居住区的中心地带，准确地说，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一假说未获得普遍流行——下文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但是，毫无疑义，它促进了现代人类学中智人化问题的

研究。罗金斯基还对研究人类形态学的普遍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见其1962年和1964年的著作），其中包括研究形态变异并对此进行一般生物学阐释。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及其著作目录，已有专门的文章介绍（见阿列克谢耶夫1965年所著；乌雷松1985年所著）。

列文与罗金斯基恰好相反，他做了大量的收集田野资料的工作。他喜欢考察活动，他不仅作为人类学家，而且也作为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去参加科学考察。他在一篇专题论文中（写于1958年）总结了对远东各族人民的人类学及族体起源问题的研究，该文公开了他所收集的西伯利亚各族、尤其是东西伯利亚各族的大量躯体学和头骨学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作了对比分析。该书于1963年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它曾长期是英语国家学者在了解俄国人类学家研究活动的信息来源。列文不只是在远东进行工作，他还在图瓦和雅库特作考察，研究西西伯利亚现代各族的头骨材料，研究土库曼居民，还进行了大量的古人类学研究工作——他是对在威廉古墓和埃文古墓发现的大量古人类学材料进行研究的先驱者（这些古墓属于楚克奇半岛上的古爱斯基摩文化）。他的兴趣也并未囿于苏联国土的范围。他同H.H.切博克萨罗夫合作撰写了有关人类徙居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文章，该文把关于地球上人数很少的种族类型起源的有益研究公布于世，有力地论证了非洲和亚洲种族形态独立形成的观点。他还为在其去世后出版的有关日本人类学的巨著（1970年出版）准备了材料。

列文熟悉俄国的和世界的科学文献，他在俄国进行了研究人类学史的大量工作。他为俄国人类学的奠基人K.M.柏尔、A.П.博格丹诺夫、П.Н.阿努钦撰写了内容丰富的传记，多方面地展示了苏联人类学发展的情况。在完成上述出版物的基础上，列文于1960年写出了第一部概述俄国及苏联人类学思想发展进程的巨著，该书叙述的年代从社会民众和学术界最初对人类学发生兴趣时开始，直到他去世时为止。

为充分展现在列文身上体现出来的现在已很罕见的多学科创造热情和兴趣，就不能不提到他在民族学方面的大量著述。阿尔泰人的社会结构，对西伯利亚考古文物中祭祀和巫术用品的语义学阐释，西伯利亚的历史民族共同体和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形成的时代继承性，同切博克萨罗夫一道制定的人类历史民族分类和经济文化分类的一般概念体系——这是他的主要研究题目，却远非全部的研究题目。如同在西伯利亚人类学和俄国人类学史的研究方面一样，列文以两部集体巨著总结了自己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他是这两部著作编写集体的组织者、主要编辑者（同Л.П.波塔波夫一起）和主要作者之一。还要提到总结性著作《西伯利亚各族》（1956年）和《西伯利亚历史民族地图集》（1961年），前者译成英文于1964年在美国出版，后者因只用俄文出版，国际知名度小些，却在具体资料方面比前者更为详尽，在方法论的运用及历史文化背景阐释方面更加深思熟虑。

上文简述了列文的一生行状，当然远非全部情况。要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去读专门记叙其活动的书（参见阿列克谢耶夫1968年和1984年所著）。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明白——我再重复一遍：列文和罗金斯基都有高度科研水平，敏锐的思想、广泛的兴趣，他们之间的合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彼此在知识上和思想上相得益彰，这使得两位科学家一道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具有真理的力量。

人类学的三个组成部分

这种“三分法”在书中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反映——其基本内容为：人类形态学，人类起源学或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民族人类学或种族学说。在苏联人类学中，相似的划分奠基于苏俄出版的第一部人类学教科书（布纳克、涅斯图尔赫、罗金斯基写于1941年），其中自有原委。在罗金斯基和列文的这本教科书

中，人类学被界定为人类机体及其种族的起源和进化的学科。同形态学有关的是研究人类躯体的正常情况、正常成形物的规律、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的变异；同人类起源学传统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比较解剖学、研究灵长类和最古老的人科化石、了解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的因素；最后，种族学说研究人种类型及其在地球各处的分布，种族的起源，地理分布与语言界线相应或不相应的形式，人类的历史文化形态和族体分析。

经过本书三版之后，“三大块”构成了人类学分类的最高层次，在上述“三大块”内部的再分类则是低一层次的划分。人类起源学部分又划分出灵长目学和化石人科学说；人种学部分又划分出普通人种学问题或简称为普通人种学以及德国人类学家过去所说的历史人类学，而苏联人类学界则称之为民族人类学的部分——换言之，即运用人类学知识去研究各民族及组成各民族的民族集团的起源问题部分；最后，形态学传统上划分为躯体学，亦即研究人类机体各部位的尺寸及其他一般特点的部分和器官学，或者，换句话说，是关于各器官的变异和特征系统的学说。人类学的这一低层次分类，立即显示出“三分法”的全部缺陷——它不能完全包括人类学的许多传统分类内容。最鲜明的例证是古人类学，从语源学角度来看，古人类学研究包括从最古老的化石人科到最晚近的中世纪出土物在内的所有化石人类（Дебец, 1948年 Wolpoff, 1980年）。另一个例证是既包括人类起源学，又包括人种学的历史人类学（Алексеев, 1979年）。器官学的一些部分。例如牙科学（Зубов, 1973年，《牙齿与人类学 Teeth and anthropology》，1986年）或皮科学（Хит б, 1983年）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人类学内一个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

体质人类学和人类遗传学这两大人类学分支的形成和独立发展，是在人类学知识旧的分类框架之外最为惊人的突破。体质人类学同人类生态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人类遗传学则处在人类学

与遗传学的中介位置。前者是慢慢地逐渐地分离出来的，它运用生理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群体，逐步把生理学方法扩大运用于人类学。196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7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体质人类学得到正式承认，大会组织了体质人类学的专门分组。大会期间，人类学家和其他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专家已经向科学界提供了大量信息，说明许多有生理特点的群体特性及其在群体适应性形成过程中的明显存在。大会以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并在一系列重大报道中得到反映。这些报道总结了事实材料，指出了进行阐释的基本方向（《体质人类学》，1977年；Алексеева，1977年）。体质人类学材料研究的理论问题焦点是适应类型问题，亦即形态生理综合特征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这种形态生理综合特征形成于对地理环境及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它的适应性反应程度，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整个种族，都是一样的（Алексеев，1986年）。

人类遗传学也结出了不少果实。首先要提到的，是大量积累了有关红血球、蛋白质和血清酶这些所谓遗传示剂的变异的具体资料。已掌握的材料十分丰富，有关报道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神速增加（参见（Mourant，Kopec，Domaniewska—Sobzak，1976年），然而，重要的是不在于有关这些或那些群体遗传特征的报道材料如何铺天盖地一样的多，重要性在于遗传概念影响下人类学思路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于新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有两个与此相关的题目最为重要，尽管人们对其意义的看法不同——第一，是或多或少停滞了的科学结构；第二，是科学探索的微露的前景方向：群体学说，计算遗传学差异时间的实验即遗传年代学。有关遗传障碍的概念，在研究系谱的基础上向群体结构的渗入，对有关群体的遗传关系亦即基因延续的性质和方向的资料进行分析，揭示人类的群体结构及其对种族形成和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我们将上述种种都归之于对现实存在的人类群体的具体研究和理论思考以及对有关信息作部分数

学模式处理的工作。在一系列重要的综合著作中对此作了报道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anthropological genetics voll, The ory and methods. New York—London, 1980 年)。

遗传年代学却没有值得夸耀的类似成果：在这里，许多设想被当作现实，“基因不变”的假说被当作立论的假说，把基因当作只产生一次或在任何情形下也很少突变的東西，把对象当作独立于可选择过程之外的东西。换言之，全部分析的基础是颇多疑问的论断，同现代遗传科学思想存在太多的矛盾（参见 Рычков, 1986 年）。这样，由于加上了人工的限制，研究假说得出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比尽可能计算光谱所作的实验得出的结果更准确。然而，这种准确性是靠不住的。当然，我重复一句，如同研究形态上的变异体变化速度及其原因的问题一样，研究该题目范围的所有问题也是十分有前途的。

以上，我们对人类学这个题目的范围和方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勾画，从中我们已可了解本书的一个思想：人类学是有关人本身的学科体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科体系（Алексеев 1972 年）。与此相左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学有其本身特点，并且将来也会保留此特点，尽管这种特点表现得不那么鲜明（Зубов, 1972 年）。为全部介绍现代有关人类学知识构架的观点，还须指出同第一种观点相平行的另一种看法——它从研究活体的构造水平来立论，可以相应地划分出假说式的分子人类学——在 Zuckerkandl, (1963 年) 之后已有专著来论述（Алексеев, 1974 年）——和细胞人类学、躯体人类学、群体人类学、种族人类学和种人类学。这种人类学知识分类的构架，尚存在许多争论，需要对一系列概念加以明确，此外，还需要依据在该分类框架中论述全部人类学信息资料，以便看看这些信息资料在这一框架内能容纳到什么程度、与之相应到什么程度。遗憾的是，这种论述迄今为止并不存在。

今日形态学

在人类学的传统分类的各部分——即本书“三大块”的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类遗传学和群体生理学的成就，暂时延缓了形态学方面科学思想的前进。然而，仍有大量非常重要的问题得以研究和理论探讨：形态学与遗传学的关系，遗传因子的出现及其在群体起源结构中的作用，构造类型同种族的关系，匀称性在整体结构及人体各组成部位上的各种表现形式，对现代人具有而其祖先身上没有的形态特征进行功能解释，等等。

现在，我们撇开躯体学和器官学，比较大量叙述了形态学两大分支即普通形态学和局部形态学——原则上即相当于躯体学和器官学（参见《人类器官学》，1983年）。对普通形态学的论述通常包括现代形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生长过程，头部尺寸及其各构成部分，躯干的尺寸及对称，躯体的构成及构成类型。在局部形态学中，通常是按照解剖学原则来组织材料：支撑，运动器官，内脏等。许多人由这些题目开始研究并给予内容丰富的高水平的阐释，他们的著述是有关相应特征变异的大量信息，并包括多方面的实验观察。人们也注意研究那些不属于形态学传统题目的问题，诸如加速度的性质及原因，对构造外形进行生物化学解释，骨骼组成部位的变异，对细薄齿列结构的解释。诚然，对这些问题进行的阐释以很多形态学材料为基础，并依据视野宽阔的比较形态学方法，不仅要研究分析正常形态，还要研究分析现代人及其化石祖先特有的变异特征。这样，可以确定出种族群团、结构群团和职业群团。遗憾的是，这么多重要信息未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收集在综合性著作中，因此，那些不直接研究人类形态学的专家对此知之甚少。

传统上被正确地划归为形态学的各个部分，构成了其顾名思

义的内容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对此进行了特别努力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变异性的研究，这早已成为不仅是比较形态学和群体形态学的重要部分，而且是进化学说、遗传学和生物测量学的基石；对保证机体统一性的矫正系统进行内容丰富的统计学分析——没有它任何形态学阐释也就失掉了意义；关于对称的学说，它如此广泛地渗入到生物学各分支，首先是形态学，并已引起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

我所列举的上述题目，并非信手拈来，它们构成了形态学作为科学、其中也包括人类形态学的最本质的东西。形态学与人类解剖学之间的关系恰恰在于，解剖学研究正常状态，研究人体的标准类型，而形态学则研究变异的形式和规律，研究人体在功能、地理和时代各方面的综合变异。因此，没有形态学，就没有关于人类机体在不同条件变异的规律性的概念，就没有对不同群团或特征类型的描述，就没有数量表述的许多方式。现在，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重要论述使人们集中注意力于群体形态学的形成（Яблоков）及遗传学的发展（Алексеев，1988年）。顺便指出，苏联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些方面已有数以千计的出版物，而有关许多特征变异性质的研究著述较少——这一洋洋大观的知识宝库向人们展示着人类形态学范畴内有关变异的学说。

人类学中不无重要和不无详细的还有关于特征矫正的学说，其内容涉及部分器官与全系统的关系、各部位参数分析、这种关系的特点、其功能意义及评价。矫正器官的原则，是首先由居维叶（Ж.Кювье）、其后又由许多形态学家给予接近于现代科学的论述后确立的，在 А.Н.谢维尔佐夫（1939年）和施马尔高泽（И.И.Щмальгаузен）（1938年）的经典性著作中被表述为比较形态学分析和进化分析的强有力的中介。法国矿物学家布拉维（С.Браве）和英国数学家及生物学家皮尔逊（М.Пирсон）为定量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这一方法很快便在人类学中得到广泛应

用；正是有关各人类群体中特征之间矫正系数的资料成为阐释种族内部矫正及整个现代人类种族的变异性的分析方法的基础（参见 Алексеев, 1968）。顺便提一句，除了已经指出的罗金斯基有关特征之间联系性质的著作外，还应提到他进行的有关种族内部矫正的稳定性的专门研究（Рогинский, 1954a）。

对生理对称问题的研究，现正处于热潮。此时如同以往一样，人们的目光投向科学史并提及已被忘记的或很少引起注意的几十种著作（详细的篇目索引见：Касинов, 1973 年）。然而，新原则的提出也很热烈（见 Урманцев, 1974 年）。不久之前，针对生物客体的进化问题，讨论了保形对称的原则，并提出了证明保形对称在人类形态学中具有很大大作用的相当确凿的资料（见 Петухов, 1981 年）。目前可以等待着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左右对称性却早已为世所知，其作用也在许多经典性著作中得到阐释（Ludwig, 1932 年），许多著述已谈到了伴随着向直立行走的过渡和人类起源中真正的人类机体形成过程中的左右对称性质的变化。这是人类理论形态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富有前景的题目。

还可以列举出其他许多与人类理论形态学有最密切关系的方面，例如，分析人类机体形态学的、功能的或生理特征的关系，总体上分析形态起源的因素，综合考察人衰老的形态学特征——顺便指出，后者已由几部巨著加以阐释（《老年学基础》，莫斯科，1969 年；Гаврилов, Гаврилова, 1986 年）。我们也不能不专门指出正是最近以来引起特别热烈争论的一些问题，这指的是外部因素即食物在人类机体特征形成中的作用（参见《人类体质生长》，1979 年）。这个大题目自然而然地又分为两个次题：其一，研究食物在构成和营养方面以及其传统搭配方面的全球差异；其二，评价食物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个体发育和生长过程早期阶段的作用。如此看来，人类学科学论著的这一观点，就把形态学同历史文化和历史经济学科即广义的民族学紧密

地联系在了一起。

化石人科的新发现及种族系谱

罗金斯基在教科书中广泛而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有关人类起源后期的概念，具体说，就是有关现代人起源的概念。正如上文所述，按照他的概念，人类形成于地中海地区，也可能是前亚和南亚地区，而后移居于整个旧大陆。在这一概念框架中，现代人最初形成地区的扩展，从地中海东部到欧亚大陆的整个西南地区，这反映在罗金斯基的所有著作中。列文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完全赞同罗金斯基的单中心起源假说，因此在本书中表现为两位作者的一致观点。

罗金斯基本人称自己所构拟的是宽泛的单中心假说。这一假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行而成为普及知识。然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为数众多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反对意见，而且，对这一假说的批评及向魏敦瑞的多中心观点回归的趋势随着古人类学知识的积累程度而增强。在对同一地域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进行综合统计对比时，三组中有两组的关系已经确知：欧罗巴种与欧洲尼安德特人、蒙古利亚种与中国猿人有相应关系，只有尼格罗种与罗得西亚尼安德特人之间未表现出相应关系。罗金斯基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种关系，然而，该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却无疑在批驳他的单中心假说。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向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过渡的特点是最雄辩的考古证据（Дебец, 1950 年）：在依据单中心假说解释为尼安德特文化层中形成现代人群体的地方，以及在那些与此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这种文化过渡的特点是一样的。

罗金斯基不止一次地指出，在东亚地区的早期和中期旧石器时代工业与晚期旧石器时代工业之间没有前后继承性——这一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十分重要。在给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讲课时，他经

常谈到，在早期和中期旧石器时代，东亚地区可能尚无人居住。后来的研究对此种证据不足的论断作了重要修正：当罗金斯基尚在人世时就出现了一部著作，它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基础批驳了罗金斯基的观点，直接证明了东亚在早期和中期旧石器时代即已有居民，并同晚期旧石器时代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吴汝康，Чебоксаров，1959年）。从那时起，相应的文物地点和化石人类的骨骸大量增多，其分布范围包括整个东亚地区（Atlas……1980；Palaeoanthropology……，1985年）。然而，更为重要的不是考古材料数量的增多，而是人们已有可能依据与认为现代人类只有一个形成中心的论断所不同的另外观点来对此进行阐释。

罗金斯基在依靠对已公布的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活动中，出版了一本关于种族特征生长过程的专著（Рогинский，1960年）。这本书吸收了一些科学观察结果——在不同的人种中，种族特征的年龄变化有不同的过程：尼格罗种和欧罗巴种在成年时期比其童年时期的差异更明显，而蒙古利亚种却是在童年时期与另外两个人种的差异特别大。依据达尔文—海克尔—繆列尔所揭示的规律，把个体发育过程投射到系关系上，就可以想见，蒙古利亚种的祖先同其他人种群体处于相当隔绝的状态，这就限定了其形成的特殊道路。研究东亚出土的古人类面骨材料可知，蒙古利亚种的形态特征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开始形成，其佐证就是面骨和鼻骨变宽的趋势，以及铲型门齿（资料索引及问题讨论见（Алексеес，1978年）。这样，蒙古利亚种祖先的远古形态起源上的隔绝状态，就获得了古人类学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最新的讨论材料可以参照沃尔波夫、吴新智和托尔纳的详尽著述（Wolpoff，WuHinZhi，Thorne，1987年），该书除去为数不多的变体外，论述了东亚是人类种族早期发祥地的思想。

对本教科书的总体评价